

文学故事丛书



TAMEN
HEQI
XIANGSI

奥加涅索夫

他们何其相似

附《荡秋千的男孩》



7512.1
229
2

他们何其相似

附《荡秋千的男孩》

〔苏联〕奥加涅索夫

路 芑 石 敏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《他们何其相似》和《荡秋千的男孩》是两部法制题材的中篇小说。它们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家庭和社会矛盾导致青少年道德沦丧，终于堕为罪犯的悲剧。

尼古拉·奥加涅索夫是苏联律师兼作家，作品素以青少年问题为主要题材，旨在揭示苏联当前尖锐的社会问题及其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。创作上善用电影表现手法，结构新颖，悬念性强，同时注重心理刻画，文字活泼洗练，赋予作品以情理交融、娓娓动听的散文风格。

这两部小说在苏联都曾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《荡秋千的男孩》曾获《接班人》杂志一九八〇年“优秀作品奖”。

他们何其相似

TAMEN HEQIXIANGSI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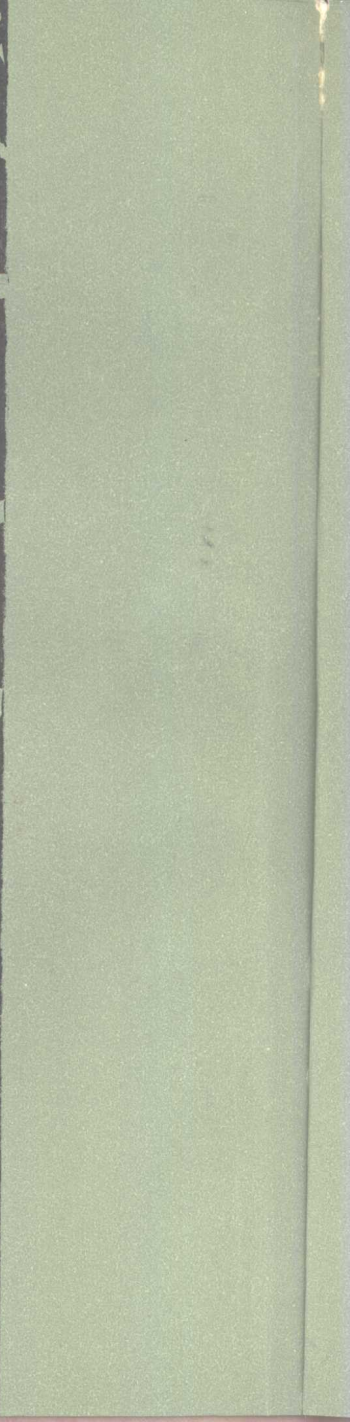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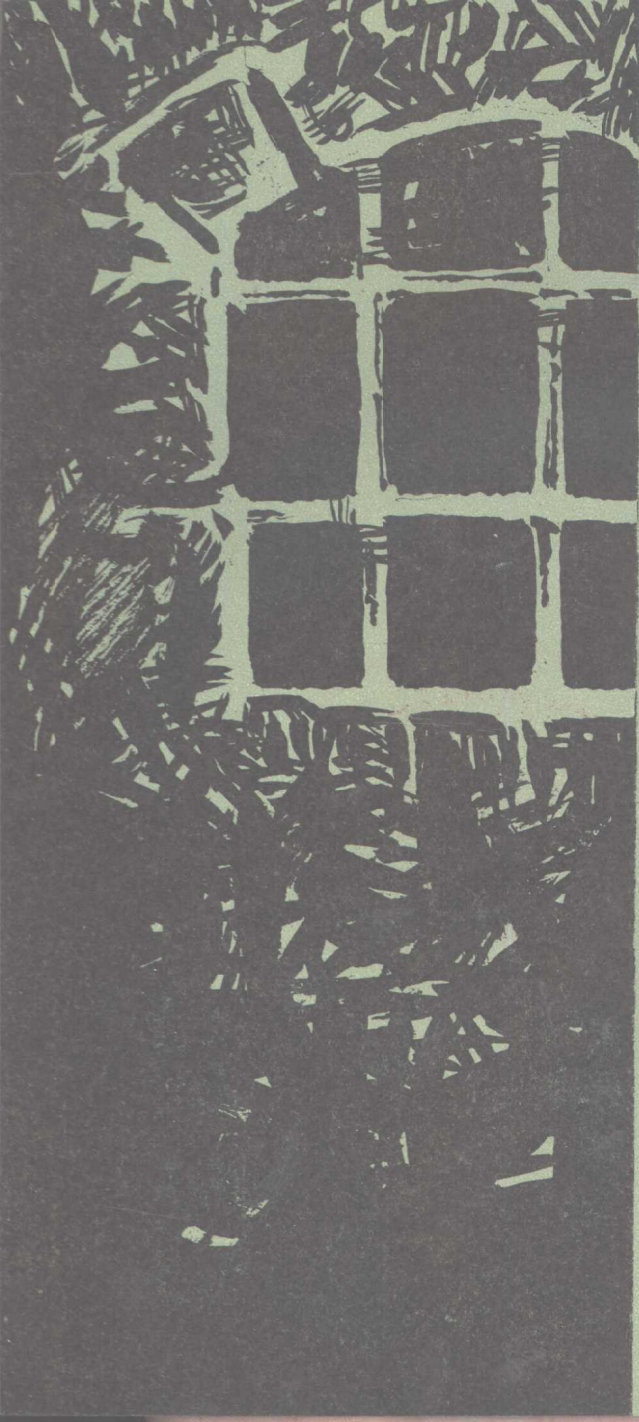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 217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1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8,180

书号 10019·4164

定价 2.05 元



目 次

荡秋千的男孩	石 敏 译 (1)
	段世骥 校
他们何其相似	路 芑 译 (227)

荡秋千的男孩

石 敏 译 段世骥 校

НИКОЛАЙ ОГАНЕСОВ
МАЛЬЧИК НА КАЧЕЛЯХ

«СМЕНА», 1980, №10—16

房间里，靠窗口亮着台灯。只要稍一回头，我就能看到正坐在伞形灯光下埋头读书的妻子。但我在看另一侧——越过坐在对面的女儿，隔着阳台栏杆向下眺望。

下面没有什么特别的：市区的车辆在马路上川流不息，孩子们在院内儿童游戏场的沙地上玩耍。一个手提旅行箱的年轻人走到邻近的楼房门口。他在那儿犹豫不决地踏着脚，一会儿把提箱放下，一会儿又拎起来，最后慢慢地、目不旁顾地上了台阶。

他那体型、拱肩、步态都使我感到有些似曾相识。奇怪，眼下我联想到的那个人，我总共不就是只见过他一次嘛。再说，也已经很久了。这不是他，当然不是他……

我的想象中出现了一个正在荡秋千的男孩。他向上荡去，越荡越高。阳光在树枝间闪闪烁烁，令人目眩，于是他好象觉得他直向天空飞去；而当秋千一泻而下的时候，他感到喘不过气来，使劲眯缝起眼睛以免看见迎面扑上来的地面……

维舍米尔斯基案件是我在民警局经办的最后一桩案件。我又一次回想起那些细节：那幢小屋、苹果园、落满枯黄树叶的阳台……一切微小的细节又顿时浮现在眼前。

那是星期一，九月二十四日……

第一章

九月二十四日，星期一

1

我走近车门，刚来得及看了看前面仪表盘，就被一股什么力量把我推到后座的靠背上。当时表针正指在六点半。

检察院的司机萨尼亚对他驾驶的这部半新不旧的“伏尔加”汽车上的每个零件都了如指掌，能把这部车的功率发挥到最大限度。对“快”这个词儿他向来只有一种理解，翻译成他的行话，那就是“开足马力”。他开足了马力。

我身旁坐着沃洛布耶夫。不知他是在闭目养神，还是在思考问题。他所想的也许就是眼前碰巧由我俩一道去调查的这桩案件？事情是这样的：检察长向他布置任务时，恰巧我也在办公室——我是来了解调动我工作的具体日期。检察长刚一交待完毕，我竟连我自己都完全感到意外地突然请求到出事现场去。

“可以，”检察长说。“去吧，我不反对。”

我俩就这样来了。说实在的，我还不太清楚我是以什么身分来的。真的，我算什么角色呢？是即将卸任的民警

031482

局刑警队长还是将要上任的检察院侦查员呢？调动的事已经决定，我还有七天随我自由支配的时间，这是上级最后给我的假期。“谁叫你多嘴呢？”我暗暗责骂自己，不由地想起在民警局工作多年来养成的一种独特的条件反射——只要一出事，我便不顾一切地赶往现场。但此时此刻这个思想却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快意。有什么办法呢。我脑子里开始一等地回想检察长告诉我们的那些情况。

民警局接到一个匿名电话。一个不愿吐露姓名的男人在电话里说，多瓦托尔街一号住宅里出事了。市局值班员刚想问明究竟出了什么事，那人已挂了电话。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接到谎报案件的电话的事并不少见，虽说这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，但流动民警队还是按所说的住址驱车赶去了。直觉没有使值班员难堪，情报属实：的确是出事了。在现场发现了维舍米尔斯基教授的尸体。立刻叫了急救车、法医和检察院的侦查员。

汽车减慢速度，离开公路拐弯了。从这儿已能望见下面的街道和两旁的平房。透过初秋时节日渐稀疏的树冠，泥瓦屋顶和灰色石板屋顶清晰可见。新的建筑工程正向这个地区扩展，街道上处处有新建筑物。右下方是一片四周已经打好了的混凝土立桩的基坑。紧挨着基坑，在一辆不大的工程车旁孤零零地停着一台打桩机，从上看下去活象一匹大河马。

我们的车子要通过一段滑溜的下坡道，路面被雨淋湿，很不好走，但我们总算顺利地来到了地基旁，在公共汽车站

转了个弯，把车停在和急救站的奶油色面包车并排在一起的民警局的“嘎斯”车旁边。在住宅门口值班的中士向我们敬了个礼，抢先为我们打开篱笆门。沃洛布耶夫径直走了进去，我留在外面熟悉一下环境。

这是一幢青砖砌成的普通旧式平房。墙上钉着搪瓷门牌“1号”。临街有两扇窗户。气窗开着，窗框是单开的。篱笆墙虽旧，但很牢固。

墙里面是荒芜的苹果园，杂草丛生，高可没足。铁支架长椅上满是白漆脱落的斑痕。果树之间有架秋千在微微摇晃。

阳台上放着三把藤椅、一张藤桌。桌上有一只盛满雨水的花瓶，插着十来支野菊花。这使我不由地想起刚看过的一本书的书名：《别墅胜地》。我一向觉得人住在这种房子里，日子应该过得从容、宁静、悠闲。让我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，我是不会拒绝的。这大概要等二十几年以后。

过厅是个狭长的空房间，把整幢房屋分隔成两部分，墙上挂着几幅发黄的版画。过厅里亮着一盏手提灯。

2

洛格维诺夫站在门口迎接我。

“地面已经检查过了。”他闪到一边让我进入过厅，接着象个热心的解说员似的向我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：“左边第一间是教授的儿子尤里的房间，他现在还没有下班。第二道门是厨房，从那里进去是洗澡间和卫生间。右边第一间是空

房，旁边的那间就是教授的住房。”

“有间空房？”我追问了一句。

“以前是教授夫人住的。这是科里亚金说的，”洛格维诺夫用眼睛示意了一下正站在过厅尽头的一位证人，“他是维舍米尔斯基家的邻居。”

这个男人穿一件旧绒布上衣，里面没有穿衬衫，只有一件背心。他肯定地对我们点点头：

“她十三年前去世了。”他说着，用拳头堵着嘴干咳了几声。“他感冒了，要不就是抽烟太多，”我心里想，同时私下注意到科里亚金提到教授夫人去世的准确时间。

我往厨房看了看。一位刑事侦查员正在忙碌着。他冲我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，继续干他的工作。我以在这种情况下必需的谨慎态度打开电冰箱。最能说明一个人生活方式的莫过于放在冰箱里的食品了。当然，这是我个人的观点。冰箱里面放的是典型的单身汉常吃的东西：酸牛奶、鱼罐头、奶酪、香肠。香肠切得厚薄均匀，一望便知买来就是切好的。“这没什么奇怪的。我们已经知道教授是个鳏夫，从各方面看来，儿子也还没有结婚。”

我和洛格维诺夫从证人身边过去，进入一间宽敞的、几乎是正方形的房间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具老年人的尸体。他半躺在摇椅里，背朝临街的窗户。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条纹睡衣，脚上趿着软底拖鞋。身体的一侧和扶手之间有一本厚书，里面参差不齐地夹着许多书签。僵直的右手耷拉到摇椅翘板的地方。在手下方的地板上，有一台长方形塑

料壳的录音机。

“是掉下来的，”洛格维诺夫告诉我，他已经作过现场调查，主动地帮助我熟悉情况。“机子的录音键盘开着，但电源切断了。我们检查过了，机子没有毛病，现在就能录音。”

法医正在检查维舍米尔斯基的尸体。他不时地直起腰活动活动肩膀，擦擦额头上的汗水。沃洛布耶夫站在法医身旁，索特尼钦科坐在写字台前作验尸记录。

我又把目光转向录音机。洛格维诺夫插上插头，录音机上的绿色指示灯马上亮了，与此同时，录音匣里左边的轴空转了起来。“磁带呢？”随着我的这句问话，指示灯闪动了一下。奇怪：机子的录音键开着，插头却被拔下来了。这还只是第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。第二个又接踵而来。

“磁带不见了，”洛格维诺夫说。“房屋里、花园里、外面街上我们都找过，哪里也没有找到。”

听了他对我说的这几句话之后，我终于意识到我们到这里来是很有必要的。不是作为旁观者，而是作为专业人员。

“不仅如此，”洛格维诺夫接着说，似乎是想消除我最后的怀疑。“过厅里还发现几个鞋印，是男人的。这说明，下雨的时候或者稍晚些，在我们到来之前不久，曾有人来过。”

“鞋印上沾着泥，是吗？”

“泥中混有沙子，是粘在鞋底上的。”

我刚想问我们在楼跟前看见的那个工地情况，他已经意识到了我的问题，说：

“施工用的沙子撒得满街都是。工程暂时停了。工地上连个看守人也没有。至于那个男人，从脚迹判断，他进屋时从容不迫，还在过厅里教授的房门口停留了片刻；然而出去时，您瞧，几乎是跑走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录音磁带不可能是他拿走的了？”

“这点可以排除。他没有进教授的房间。”

“没有用狗试试吗？”

“用了。狗嗅到了脚迹，追踪到离马路一百米远的地方便失去了目标。”洛格维诺夫朝他认为该是马路的那个方向扬了一下头。“看见公共汽车终点站旁边的电话亭了吗？脚迹一直延续到那儿。再往远去，到柏油马路边就不知去向了。这个男人很可能上了汽车。”

“有轮胎印迹吗？”

检查员点了点头。

我走近占了一面墙壁的高大书架，书架前放着一张椅子。曾有人站在上面够过顶层一格上的东西。这很明显，因为顶层一格上缺了几本书。于是我继续推想，“这个人”为了在椅子上站稳，用手抓住书，他一时失去平衡，书便掉了下来。

“地上有书吗？”我问了一句，不怀疑会听到他的回答。可是洛格维诺夫的话却又让我吃了一惊。

“不光有书，”他说，“还有一个硬纸盒，里面装着几张票面为二十五卢布的纸币。”听他说话的口气，我明白了：这还不是全部情况。他说着，从窗台上拿来一本绿皮书。“喏，这

是一本巴尔扎克文集，也摊在地上，翻在第四百八十八页。”

在标题《爱的执著》稍上方，我发现了一个鞋印。痕迹虽不太清楚，但能辨别出是一只女鞋的后跟和前掌，鞋的号码大约是三十六号。

洛格维诺夫用手指点了一下书页，说：

“上面的泥沙和过厅里鞋印上的一模一样。”脑子里自然而然地冒出了一个极其朦胧的、初步的、唯其初步才十分经不起推敲的设想：屋子里来过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是同伙。男的站在门口，女的进了房间，蹣着椅子，从书架上拽出纸盒，取走了钱（为什么不全部拿走？）和一盘录音磁带（目的何在？），然后……

“得了，别胡思乱想。”我告诫自己。“你对教授的死因还一无所知呢。”

3

半小时后，我们站在阳台的石阶上等着。

先是卫生员抬着担架从屋里出来。从盖着维舍米尔斯基尸体的被子底下，可以看到他死灰色前额的一角和一绺花白鬓发。

法医跟在卫生员后面走出屋来。

“瞧，连擦手的東西都没有。”他埋怨着，把湿淋淋的手指尖插进口袋去掏手帕。“九月了，还这么热。往后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还会更热。”洛格维诺夫板着脸应了一声。

他的心情不难理解。面对这提前猝然中断的生命很难无动于衷，即便你不得不比别人更常与死亡打交道，想习惯这种事也是不可能的。

我们沉默了片刻。

“打算立案吗？”法医转过身去问沃洛布耶夫。

“这取决于您。”他简短地答道。

“真的吗？”法医故作惊异地说，眼下的确有许多事要由他来决定，因而他颇为得意。“好吧，有些情况在尸体解剖之前我可以向诸位报告一下。”他慢吞吞地把手帕放回衣袋里，那样子就象在考验我们的耐性（说不定真是如此）。然后他接着说：“死亡发生在大约三小时之前。也就是说，”他看了看表，“在十七点左右。至于死因嘛，暂时我还没有什么根据作出暴力致死的推测。教授本来就有心脏病。我想，沙发旁边小柜子上放的那堆药，你们也都看见了吧？”

我和沃洛布耶夫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，我猜到了他在想什么。如果排除了谋杀，剩下的就只是盗窃的嫌疑。那么，检察院的代表在这里就无事可干了，因为侦破盗窃案是民警局的事，也就是说，与其说是他的事，不如说是我的事。沃洛布耶夫在等我的反应。

“心得安、硝酸甘油……”我开始清点起来，他马上明白了。

“简单地说，药品齐全。”这次法医对我说道。“我没有发现外伤，也没有闻到什么别的异味。”

这个人象别人，他有一个在我看来难能可贵的品质：